

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1840-1949)

中宣部干部读本

程 漱
温 乐 群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农村变迁史论

中国农村变迁史论

中国农村变迁史论

中国农村变迁史论

中宣部干部读本

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1840—1949)

程歆 温乐群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1840—1949/程歆，温乐群 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ISBN 7-300-03169-2/K·244

I. 近…

II. 程…温…

. ①经济发展 - 概况 - 中国 1840—1949 ②政治 - 概况 - 中国 1840—1949

IV. 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4316 号

中宣部干部读本

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1840—1949)

程歆 温乐群 主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62514146 门市部：62511369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E-mail: rendaf@public3.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875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0 000

定价：1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言敏 史桂芳

田小平 许 云

张彦丽 郭正秋

温乐群 程 歆

前 言

这本描述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政治关系和社会状况）的简明读物，是我们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为国家公务员特别是为宣传部门的同志撰写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小书做一点史学改革的尝试，或者说，让史学走出历史研究者之间对话的范围，为在党政机关从事实际工作的年轻的同志调整改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质的需要，提供一些帮助。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即自觉其有历史传统并且自觉地维系和传承这一传统的民族。从历代精英到村夫野老，都有评古说今的爱好、寻根溯源的兴趣、积累经验的习性，并将自身在生活情境中摄取的新的认识和智慧融入历史传统，用以衔接民族的既往和未来。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重视学习、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历史遗产，把总结历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为了鉴往知来，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曾多次要求全党认真读一点历史。今年1月11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他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认真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近代以

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艰苦奋斗的历史，从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从形成到终结，中国民主革命（由旧式转向新式）从发生到胜利的历史。这个剧烈的政治和社会的变动过程，蕴含了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历史资源。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现状，大多是近代多种历史脉络的延伸和发展。当代人们关注和继续加以研究的许多课题，也往往是当年政界学林已经觉察但没有来得及解决的课题。因此，当我们改造现实的时候，谁能更深切地了解这段刚刚走完的民族历程，谁就能更多地从中获得精神营养，就能更自觉地以史为鉴，陶冶情操，明辨是非，把握行止，预瞻未来。

关于这本书的写法，我们在事前曾征求过几位分别从事宣传工作、企业工作和在基层党政机关以及党校工作的同志的意见。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鉴于目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读本比较多，因而建议本书在照应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相对偏重于历史专题性的论述。比如，他们希望本书对中国前近代和近代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有关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等方面的状况和问题作简要描述；对于反映社会规律的重大思潮和历史事件，特别是对史学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加以介绍和评说；对于当前舆论界关于近代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还希望本书能通过典型而生动的史实来反映历史的风貌和进程，尽量写得活泼好看一些。应该讲，这是一些很好的但对我们的写作却是难度颇大的建议。在几经讨论之后，形成了目前这个本子的写作框架。

本书第一部分（一），是对走出中世纪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的描述。在这个历史时段特别是在 18 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积累了若干从明清以来发生的重大的历史新趋势，形成了传

统中华帝国体制所难以应对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格局，从而在中国内部孕育了社会继续发展的动力。同时，中国和西方各自发展的历史势头又在互相接近，凸现了这两个世界正在越拉越大的时代差距。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变动中，形成了此后贯穿于中国近代乃至影响到中国当代的历史脉络。不仅近代直到当代的中国疆域和 20 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规模是奠定于那个年代，而且当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变动，也演化出近代历史的基本面貌。因此，我们讨论近代史上的各种问题时，应该从中国国门破毁之前所发生的多种历史变动开始叙述。

本书的第二部分（二至四），分专题描述了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生历史转折的过程和状况，力图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反映中国近代的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年代。这是一幅血与火的画卷。中国被逐步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并被迫屈从于这一体系所产生的广深后果，晚清和民国政治的全面衰败，外部危机和内部矛盾所共同促成的社会动荡，构成了这个时段的历史底色，也规定了近代进步潮流应对危局的理论思考和救国实践的基本特征。

第三部分（五至十），简明地叙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艰苦奋斗的历程。我们在这里力求说明，近代的先进人士和广大民众背靠什么样的社会场景和社会心理环境，以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资源来迎接时代的挑战，怎样根据内部变动的需要来吸纳和改造外来的先进文化，提出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救国方案并为之努力奋斗的。这个过程，并非对于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已经变动了的世界格局中，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和斗争史。

概括地讲，长达 109 年的中国人民的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经历了三种世界观和三种国家学说的选择和转换。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是近代早期救国思潮及其政治实践逐步形成的时期。在变动了的政治—社会格局中，从通商口岸到内陆州县，从京师中枢到乡土社会，形成了多头并进、错综复杂的思想场景。当时的人们虽然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了时局的变动，但在回应这场变动时却并未从根本上怀疑传统学说的有效性。出自各种立场的变革方案和政治实践，基本上仍表现为调整或重建传统帝国理想秩序的努力。甲午战败和随之兴起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救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上述格局。由于民族危机和内部危机的激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论和民权学说的系统引进，先进思想界中几乎是同步出现了谋求局部变革（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或实业救国）、全面改制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三种潮流。这三者从本质上讲，都旨在经由不同的道路，争取建立取代传统帝国体制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争论和实践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政治爱国运动为起点，开创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及其政党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更深刻的分化和组合的时代。一方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逝世后发生了复杂的变异和分解；严复、梁启超等在清末始倡的自由主义也衍化出形形色色的政治集团和思想流派。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适应于历史潮流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异军突起。如上各种政治力量依托于既往的历史经验，展开了怎样认识中国国情和哪一种主义能够救国的尖锐交锋。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建立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为理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集中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伟大构想。这一思想体系，“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5页，人民出版社，1991），从而为广大

人民走向新中国的斗争打开了胜利的通道。至此，中国人民不仅唾弃了既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统一也没有造成社会进步的中国国民党的官方学说，也对游移于国共两大营垒之间的自由主义思潮及其不切合中国国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丧失了兴趣。历史的苦难终于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了补偿。中国人民在百年噩梦结束之后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如果以上内容能为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将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莫大慰藉。

本书主要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几位研究者合作撰写的。李文海同志对本书的框架和写作方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为使其内容更能贴近读者的需要，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在本所取得硕士学位，现在任职于宣传部门的同志参加了写作。作者与分担如下：

一、四，程歆；二，许云；三，王言敏；五、六，张彦丽；七，郭正秋；九，史桂芳；八、十，田小平、温乐群。程歆和温乐群对若干初稿作了较大的改写和补充，并负责定稿。

本书的欠缺不当之处，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主 编

1999年5月

目 录

一、走出中世纪的前夜	1
1·1 大清帝国素描	1
1·2 盛世和危机	10
1·3 严峻的外部挑战	22
二、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28
2·1 一幅血与火的画图	28
2·2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37
2·3 是民族危机还是现代化“良机”	50
三、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	56
3·1 政治格局的变迁	56
3·2 触目惊心的政治腐败	62
3·3 积重难返的经济困境	68
四、层见迭出的社会问题	75
4·1 人口的压力	75
4·2 灾荒和饥谨	82
4·3 教门和帮会	93
4·4 罍粟之妖	100
五、近代早期的救国探索	107
5·1 嘉道士林风景	107
5·2 太平天国蓝图	119
5·3 洋务和经世的汇通	127

六、资产阶级的维新和革命·····	140
6·1 救亡浪潮中的思想启蒙·····	140
6·2 本土色彩的虚君立宪·····	151
6·3 “建立民国”的业绩和挫折·····	161
七、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73
7·1 反思和选择·····	173
7·2 科学社会主义异军突起·····	182
7·3 中国共产党的新探索·····	195
八、工农武装割据·····	207
8·1 山上山下之争·····	207
8·2 艰难岁月·····	217
8·3 逆境中的曙光·····	222
九、伟大的抗日战争·····	231
9·1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231
9·2 敌后烽火和正面战场·····	238
9·3 兵民是胜利之本·····	247
十、走向新中国·····	251
10·1 重建中国的三种设计·····	251
10·2 大决战·····	260
10·3 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意义·····	268

一、走出中世纪的前夜

1.1 大清帝国素描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中世纪”即封建社会显得特别曲折和漫长。从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直到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清帝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备、前后衔接的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虽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发生过数十个朝代、数百位皇帝的风云变迁，形成了世运兴衰不定，王朝更迭交替的社会景观，但是基于牢固紧密的小农业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关系的顽强的再生机能，封建帝国的巨轮总是一再度过危机而存在下来。

然而，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又不是静态的、僵死的秩序，而是一个情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封建制度的外壳之中，其经济、政治关系和文化形态都经历了一系列损益沿革、起承转合的变迁。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巅峰，同时这个社会的内部也出现了若干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而东方和西方各自发展的历史势头，也在这个时代逐渐接近。这种为当时的人们未及觉察和理解的内部和外部的变动，已然使中华帝国处在了走出中世纪的前夜。为了讲清楚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我们有必要略费笔墨，对这一变动前夜的景况做一些粗线条的描述。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入主中原的满族贵族，是居住在中国东北境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的后裔。公元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完彦部出了一位首领阿骨打（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他被描绘为正直强悍的部族英雄），领导女真人击败辽国，建立大金，在中国古代史上开创了和宋、辽、夏并列的一个王朝。此后蒙古兴起，从1227年至1279年相继灭西夏、金和南宋，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元朝（1271年—1368年）。至明初，女真人分为受明朝管辖的建州、海西和“野人”三部。1583年（万历十一年）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内部暨女真各部的长达数十年的征战。这时的建州女真已经开始由采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他们从昂贵的人参、貂皮和珍珠的贸易中获得了统一事业的巨额财源。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单位——旗。这是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旗来编制的具有行政、军事和生产三大职能的组织。此后由于一些蒙古旗和汉人军队的归附，到1615年“乃析为八”，即在原来的四旗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这就是著名的八旗建制。同年，努尔哈赤和八旗旗主、议政王大臣实行联席议政，形成了氏族社会军事首领的合议制度。贵族军事首领统率的八旗大军，在17世纪至18世纪成为亚洲最强大的部队。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又称后金）。八旗步骑在关外连续向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地方政权发动进攻，夺取了抚顺、沈阳、辽阳等重镇。1625年（明天启五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也就是清朝发祥地的盛京。

奠定了女真统一大业的努尔哈赤在1626年辞世。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后仿照明制，加速了国家政权的封建化过程。皇太极加强了汗（王）权，建立了和王大臣议政制度并存的六部和其他中枢机构，逐渐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身

边，相继拥有一批籍隶辽东地区或自关内归附的文臣武将，像祖辈在北京当过尚书的范文程、被俘归顺的洪承畴，以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祖大寿（吴三桂的舅父）等战将。这些熟悉中原的政治经验、文化传统和军事战略的汉臣，成为满洲贵族知己知彼并借以联系中原腹地官僚士大夫的中介。皇太极还通过倡扬喇嘛教和军事征伐，统一了漠南蒙古诸部和黑龙江流域，也和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以及西藏的政教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国号“大清”。这是一个刚刚完成了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农奴制度的生气勃勃的政权。

1643年皇太极病故，他的儿子、6岁的福临（顺治帝）在叔父多尔袞等扶持下即位。次年5月末，八旗兵在吴三桂的引导下长驱入关。6月6日（顺治元年五月初二），多尔袞率清军进入此前被李自成农民军占领的北京。

在此后的近40年中，定鼎北京的清王朝进行了统一中国南部的多次征战。这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它包括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的几个小王朝，铲除南明覆灭后进驻闽粤云贵等地的尚可喜、耿精忠（耿仲明孙）和吴三桂等三个军事割据集团（三藩）的一系列军事征战。1683年即平定三藩的两年之后，康熙皇帝从郑成功的后代手里收复了台湾。这一系列征战，最终确立了有清一代的立国根基。

清王朝统一中国的几十年，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苦难的时代。在华北，满族贵族和八旗开展了大规模的旨在扩大贵族特权地位和解决八旗生计的圈地运动。前后20多年，在广袤的华北地区圈出了总数约在15亿亩~22亿亩的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兵庄田，迫使大批农户破产逃亡。在南征以及在强制推行剃发易服政令的过程中，清兵对坚持抵抗的地区烧杀抢掠。1645年清军攻破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屠城10日，死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嘉定经前后三次屠城，死2万余人，史称“嘉定三屠”；江

阴破城后死者近 10 万人，仅 53 人幸免；湖南、两广一带，“弥望千里，绝无人烟”^①。为了对付站在南明一边的郑成功从闽南向镇江、南京的北伐，清王朝于 1662 年严行海禁，强行撤离从山东到广州沿海地区的人户，沿海城镇村庄夷为废墟。

牧猎余风和农奴制度，暴力统一和民族隔阂，在清朝开国史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然而，清朝统治者毕竟和起兵于草原汗国的元朝不同。由于在辽沈平原上就形成了“师明之长技以制明”的传统和入关以后对于中原社会政治体制的相当全面的继承，更鉴于各地人民激烈反抗的经验教训，清朝从顺治到乾隆等几代头脑清醒、颇有作为的皇帝，一步步调整了自己的统治体系、社会政策和用人制度。到 18 世纪初，社会秩序业已稳定，汉满矛盾趋于缓和，一个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联合专政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得到了巩固。

有人这样概括过事属巧合的清朝历史：清朝是以小儿兴，又以小儿亡，1643 年摄政王多尔衮扶助 6 岁的福临开创了一朝基业；到 1908 年，福临的第七代孙、摄政王载沣扶持 3 岁的儿子溥仪登基，随之而来的是清帝国的土崩瓦解。为时 268 年的大清帝国，跨越了由中世纪向近代复杂转折的历史。

这个王朝由于自身历史的逻辑，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皇权专制的巅峰。鉴于军事贵族合议制度在开国前后已经同统一集权的君主制度时生扞格，更为了维护一个边疆民族的权贵对于地广人众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清朝开国后的几代皇帝都极度关注从双重政治空间集中权力：一方面，在爱新觉罗皇族宗室内部，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争权残杀，康熙果断而带有戏剧性的清除鳌拜集团，雍正严厉打击同“夺嫡事件”有牵连的王公旗主，

^①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到乾隆主政时，满族王公实际上已经无权再参与政务。另一方面，则是清廷对汉族士大夫实施的笼络与高压并举，以及高树君主权威的政策。虽然沿用前朝官僚、重开科举制度、尊重儒学道统等举措体现了清廷争取汉族士大夫和化解民族敌意的长远用心，但满汉畛域心理的长期延续，又构成了前代所无的刺激君主集权的因素。诸如八旗驻防、汉满隔离、部院官职满汉并立、地方督抚多用满人，以及大兴文字狱等等，都反映了满族君主对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反抗可能性的极度敏感和严厉防范。

对于清代君主采取高度集权的上述政策举措，许多书里都有过论述，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君主们是怎样从理论意识形态上来阐释他们实行集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虽然清朝皇帝表现了对儒家道统的尊重，并以程朱理学为国家认可的正统学术，但是，他们对儒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士大夫政治和士大夫的使命感，却不屑一顾。雍正皇帝在1724年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驳斥北宋欧阳修旨在提倡士大夫集体政治行动的《朋党论》。欧阳修认为，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雍正在他的同名论文里则反复申说，臣子当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即使是标榜忠公体国的结党也决非君子之所应为，而只能被小人们用来营私作弊。雍正于次年将此文和《圣谕广训》一起发给各级学校，令学子们于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次熟读。乾隆帝不仅在上谕里常用雍正的遗训来警戒臣工，而且进一步向程朱理学奠基者程颐的一篇论文发难。程颐写过一篇倡扬士大夫政治使命感的文献《论经筵札子》，认为士具有匡正君王、经济天下的使命，可以为帝师，任宰相，身负天下之兴亡。对这一论说，乾隆直斥之为“目无其君”：“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但人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此不可也。”他指出宰